

全球智库半月谈

- 迫在眉睫：五位诺奖得主眼中未来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
- 逆势而为：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干预卓有成效
- 进口产品的作用与进口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 为什么央行应当增加政策透明度
-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崩盘危险？
- 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本期编译	陈 博	郭子睿
	黄杨荔	李 骁
	李 想	刘 洁
	刘兴坤	沈仲凯
	苏 丹	许平祥
	杨 原	邹静娴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 帆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 强	国际金融
	茅 锐	新兴市场	陈 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 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 帆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迫在眉睫：五位诺奖得主眼中未来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 4

导读：五位诺奖得主讨论各自眼中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分别将全球变暖、需求不足、持续停滞、包容性和不平等视作迫在眉睫的挑战。

逆势而为：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干预卓有成效 9

导读：一直以来央行的外汇干预措施多被归因为出于预防性或重商主义动机。但本文发现另一动因——即稳定汇率水平，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干预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此次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汇率水平普遍出现了与均衡水平的较大偏离。现在来看，汇率干预措施确实卓有成效，且相较于贬值压力而言，为抵住升值压力的干预措施效果更加明显。

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课程改革？ 11

导读：目前的经济学课程几乎是主流经济的单一范式，这阻碍了经济学进步。我们需要在教育体系中增加理论、方法论和跨学科的多元性，并在课程中引入复杂性，以使其更贴近现实世界。

全球治理

日本与亚太经济合作：寻求超越 TPP 15

导读：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推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安倍政权将加入 TPP 作为其提振经济“第三只箭”的一部分，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命运与是否成功达成 TPP 协议密切相连。但是，目前 TPP 谈判进程举步维艰，迫使日本不得不寻求超越 TPP 的经济政策。

进口产品的作用与进口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18

导读：本文选取 26 个国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进口成本与企业的原材料投入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口成本与进口额之间或许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上述结论极为重要，因为近期有些研究指出进口原材料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应以名义 GDP 为目标 22

导读：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依然在找寻（与公众）一种透明而可信的交流，然而通过前瞻指引或承诺来传递其意图有时会造成负面约束。本文认为，相比较于将通胀作为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若以名义 GDP 为目标，则将面临更少供给冲击与贸易冲击。

为什么央行应当增加政策透明度 25

导读：当面临危机时，前瞻性指引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本文认为央行应当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向公众阐明央行将会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形，货币政策也会变得更加有效。

结构性改革降低国家风险 28

导读：面临高风险溢价的经济体已经意识到采取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政府认为结构性改革发挥作用需要的时间太长，因而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本文发现，金融市场的表现反映出了结构性改革的优势。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体系中，应该加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权重。

聚焦中国

中国：拥抱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 30

导读：中国经济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长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私营企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私营企业在崛起中的三重因素，并指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或许能使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崩盘危险？ 32

导读：中国房地产市场在 2014 年遇冷。由于房地产行业和其他产业包括金融系统的紧密关联，其下滑引起了不少关注。作者认为，由于居民和开发商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此次房地产市场衰退只是周期性问题。政府还有多种政策手段可以予以应对。

战略观察

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34

导读：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整整 100 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而深入的思考。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告诫，世界大战的风险并没有完全被排除，我们绝不能盲目自信和乐观。但她同时也指出，

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规避战争的方法和经验,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利用这些方法和经验将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

以色列和埃及是时候公开放弃化学武器了 36

导读: 在纪念见证了化学武器大量使用的那场战争爆发 100 周年, 以及要求叙利亚进行化武裁军的时刻, 难道不也是埃及和以色列作出正确的事情并且使它们自己真正远离这些可恶武器的时候吗? 本文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撰写。

本期智库介绍 38

迫在眉睫：五位诺奖得主眼中未来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

IMF/文 李想/编译

导读：五位诺奖得主讨论各自眼中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分别将全球变暖、需求不足、持续停滞、包容性和不平等视作迫在眉睫的挑战。编译如下：

1、乔治·阿克洛夫：全球变暖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夫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发现，叙事方式会影响人们的思考，讲述方式不当将给人带来麻烦。今天，语言学上的这一现象正使全世界陷入困局。各国领导人每隔几年就举行大规模会议并发表庄重的宣言，但这些都设法阻挡全球变暖的脚步。现有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叙述方式没能够激发个人和政府采取行动。

地球的大气层就像保护毯一样包围着我们，它使得来自太阳的热量能够平稳缓慢地释放。年复一年，覆盖在地球上的大气层越来越厚重。短短 50 公里的路途，耗油 5 加仑，就向大气层增加了 100 磅的二氧化碳。这样计算下来，全美家庭每周将排放 1800 磅二氧化碳。将全世界的排放量加总，就不难理解全球变暖的切实发生。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全力拯救地球于水火之中。但事实上，人们讲述全球变暖的方式太过冷淡和谨慎。读一读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宣言中所谓“科学家”总结的部分，他们的言辞激昂有力，但科学的专业性与客观性束缚住了要传达的信息。大概 20 年前的一个晚宴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不知道应该和天文学家聊些什么，就说起了气候变暖的问题。他说，“我们还无法肯定是否存在由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现象。”

他的这个论述从科学话语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饱含怀疑精神。但是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看，这种谨慎或许就是愚勇了。对于全球变暖，我们的叙述方式应该要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去采取必要措施。不仅我们自己需要这样的修辞，政府也一样，从而带来立法和实际行动。

全球变暖的经济学和其他经济问题一样，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统一征税，征税力度要逐渐加大，直到排放量下降到合理水平。最优政策还包括对关于减排的研发给予补贴。然而，全球变暖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征税和补贴也应该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应将此视为自身义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同盟，所有人都要同心协力。

2、保罗·克鲁格曼：需求不足

进入 21 世纪第 2 个 10 年的中期，困扰着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全世界持久性的需求不足，人们就是不完全消费掉既有产能，这还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头一次。

基于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可以发现在 2000 年到 2007 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 GDP 增长了 18%，当时人们预测这样的增长速度将在中期得以保持。然而，事实上这些经济体从 2007 年到 2014 年只增长了 6%。

诚然，有大量观点认为经济下行的程度远没有数字显示的这么严重，WEO 的数据低估了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没有重大失败，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没人准确知道经济运行状况与产能之间的差距。美国劳动参与率、英国长期或周期生产力的大幅下降，就是因为工人们看不到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吗？低水平的平稳通胀就表示经济体正接近产能运行，或者是因为工人不愿接受降薪从而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在低通胀处非常平坦？没有人知道。其次，就生产潜力增长率的降幅与估计结果相等而言，这表明本应是短期的经济问题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全球大衰退对长期经济前景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维持充足的需求对于短期和长期而言都非常重要。不幸的是，自 2007 年以来的事实表明，经济决策机构并没有处理好庞大且持久的需求不足问题。

在大缓和时期¹，宏观经济政策渐入佳境，独立的中央银行负责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则重点关注长期的问题。然而，面对巨大而持续的冲击时，这一体系就陷入崩溃。一方面，央行受困于零利率的下限和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火上浇油。此外，这种情况还因为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不对称和政治混战而进一步恶化。我们现在意识到，大缓和时期的稳定是由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劳动人口所带来的，这两个现象都一去不复返了，而政策也没有转变的迹象。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亟需寻找到应对方法。

3、罗伯特·索洛：持续停滞

这是一个不那么司空见惯的问题：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经济体现在陷入了所谓的“持续停滞”阶段，这一现象是否会长期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无法迅速找到走出停滞的方法，那么将很难应对未来更为严重的问题。

¹ 指美国宏观经济稳定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所谓“持续停滞”，是指一国或多国持久性地增长缓慢，并且很难或者无法完全利用其生产潜力。在过去，这一问题可被描述为投资机会无法满足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回报率；今天，更通用的表述是，完全利用产能时的真实利率为负，并且有时无法达到。

之所以说持续停滞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证据。第一，未来的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比之前增长得更为缓慢。人口增长放缓是较为肯定的，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悲观情绪则基于信息科技浪潮将不能像过去那样促进产出和福利上升。第二，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保持私人投资回报率不下跌的主要力量，而未来增长放慢，储蓄会继续，但回报率将下降，私人投资将被削弱。

此外，近年来的历史事实也证实了这一悲观看法。近年来，只有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了经济繁荣，但这些泡沫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距离上次衰退已经过去了五年，而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完全恢复，这一冗长的经济疲软也与持续停滞的看法相一致。

但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大部分私人需求疲软可被归为住宅和非住宅建设支出的下跌。这不难理解，因为在危机之前的年份，经历房地产泡沫的那些经济体就面临着房屋存量的积压和抵押品市场的失序。但也有很难解释的地方：虽然企业盈利非常强势，但美国的商业投资仅有部分恢复，造成的结果就是自 2009 年以来，商业储蓄已超过商业投资。通常而言，企业部门都是净借款人，现在却变成了净贷款人，这并非持续停滞下应对投资回报率下跌的正常反应。

严谨的总结是：不一定会有持续停滞，但持续停滞是否将长期存在也不能确定。现在我们就应该开始思考合适的应对政策。

4、迈克尔 斯宾塞：包容性

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挑战在于适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并完成始于二战之后的经济收敛进程。这一观点不仅基于贫困的大规模减轻，还由于世界 85% 的人口自战后以来首次经历了显著经济增长，健康、富足地生活的机会大大提升。大规模扩张的包容性有望成为本世纪的决定性特质，但让其成为现实却比说起来困难得多。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内外在观念、政策和体制上的转变。其目的是使得发展中世界尽可能地友好崛起，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相对价格被迫变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变，财富分配状况也会相应转变。

- **环境问题**

如果收敛进程顺利，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接下来的 25 至 30 年里扩张三倍。但如果在此过程中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法进行调整，其结果不是增长逐渐放慢直至停滞，就是在生态和环境达到极限之后发生灾难性的破坏。环境的可持续性对

于适应发展中世界的崛起至关重要。自然资本是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资产，对自然资产投资不足不仅会降低增长的质量，最终还将阻碍经济发展。

- 分配问题

在发达经济体中，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的力量正通过自动化、削减中间过程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离岸生产等方式减少或消除工作岗位的扩张。这一过程进行得如此猛烈，以至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失衡，人力资本没能很好地与全球经济需求面的转变相适应。加速向均衡的回归是经济增长和公正分配的当务之急。但即使回归速度比现在更快，不平等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应对各种形式的平等问题，有人坚信应重点关注贫困并让市场来解决剩下的问题，另一些人关心那些绝对的失败者（比如失业的年轻人）以及责任共担，还有人则关注绝对的和相对的利弊比较。虽然存在这些分歧，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应加强代际向上的流动性。

- 福利问题

如果节约劳动力、侧重技术、节约资本的电子技术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强大，它将会显著提升生产率。至少在高收入国家，这所带来的“剩余”并不一定要用于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或许应该用来增加闲暇，并且工作周也可以缩短。如此一来，福利的衡量需要更为广泛，而不止限于市场交易中可被记录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 超国家治理问题

全球范围内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有不少成果：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开放全球经济、鼓励公平交易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危机下互相合作，做出关键而积极的贡献；国际金融机构在新兴经济体中为减轻贫困和稳定经济出力不少，并展现了相当程度的政策灵活性。但这些机构的治理改革仍有不足。这破坏了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削弱了协调政策的能力。此外，在金融和货币政策中，溢出效应也被很大程度地忽视了，人们的目光只聚焦于国内。

有效的超国家治理充其量只能说是还在进行之中。只需要看一下欧盟和欧元区的情况即可，如何在全球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关系网中进行监管和宏观经济管理，仍是巨大挑战。其背后的问题涉及到主权、身份认同和民主自决等等。

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规模更大、连接更紧密、经济力量分配均衡，并且在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和文化方面仍有异质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如何使得这一过程公平、稳定、可持续是所有国家及人民都面临着经济挑战。

5、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经济与政治不平等

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哪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最好？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似乎占了上风，通过华盛顿共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去管制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但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是政府拯救了市场。

在那之后，许多人重新审视了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现收入中值在 25 年内停滞不前，这说明这一体系尽管在顶层运行良好，但却没有为广大市民造福。甚至其政治体系也遭到质疑，经济不平等转变成了政治不平等，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造成危机的那些银行拒绝进行改革以防范覆辙重蹈。民主不只是政治领导人的常规选举，美国的民主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认为严重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他证实了过去三十多年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强烈增长，以及遗产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他预言这些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

我相信这种严重而且逐渐恶化的不平等程度并非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也不是无情的经济力量的结果。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是其政策和政治的后果：垄断和寡头盛行、政府给予大企业和富人大量利益、为银行提供紧急救助、公司治理缺乏、税法漏洞允许富人转移财富并偷税漏税等等，那些效法美国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现的伪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民主所带来的意料之中的结果，民主的缺陷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很快转变为政治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仅在于克服市场经济的剩余，还包括使市场运行得符合其之所以为市场的本质：激励的竞争激发创新从而提升生活水准，还包括在稳健增长的同时共享繁荣，确保经济服务于社会而非相反。每当经济“发展”到工资或社会福利大规模缩减时，我们就要扪心自问是否本末倒置了。此外，全球政治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确保民主能真正地代表普罗大众的利益。使政治脱离金钱的过程非常艰辛，但如果不这样做，经济和民主都将遭受破坏。

本文原题为“Looming Ahead”。本文为 IMF 金融与发展部门对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访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刊于 IMF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逆势而为：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干预卓有成效

Christian Daude, Eduardo Levy Yeyati /文 邹静娴/编译

导读：一直以来央行的外汇干预措施多被归因为出于预防性或重商主义动机。但本文发现另一动因——即稳定汇率水平，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干预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此次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汇率水平普遍出现了与均衡水平的较大偏离。现在来看，汇率干预措施确实卓有成效，且相较于贬值压力而言，为抵住升值压力的干预措施效果更加明显。编译如下：

以往对于央行的外汇干预举措，人们大多将其归结于出于谨慎考虑的预防性措施，或是基于重商主义而有意压低汇率的结果，而忽视了汇率水平平滑这一动机。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央行的干预措施往往主要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不愿意看到汇率水平与均衡值发生太大偏离（BIS 2005, 2013），并且干预程度往往与汇率压力相关，同时与资本管制及税率等其他政策手段互为补充。

为了弥补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缺陷，我们在新近发表的论文（Daude 等人，2014）中详尽阐述了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的外汇干预现象，并将其总结为“逆势而为”。同时我们发现干预措施的确有助于减少实际有效汇率（RER）的波动性，这也是与预期相符的。

为何以往的研究并未发现外汇干预与汇率波动间的显著关系呢？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央行买（卖）美元就是为了部分抵消本币升（贬）值压力。换句话说，汇率波动一方面是央行在外汇市场干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干预的动因。因此，以往文献中仅靠简单回归的做法可能得不到显著结果或是得到符号相反的结论；其次，并非所有的干预措施都是由汇率因素导致的——很多文献研究表明货币危机后央行往往倾向于重建货币储备，使其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或是预防性地增加储备以维持一定的外汇储备与广义货币量之比，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央行加大干预力度。事实上，Obstfeld 等人（2010）的文章就明确指出外汇干预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货币危机后恢复稳定的外汇储备/广义货币之比。

为了排除以上谈到的预防性动机同时尽可能减少反向因果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调整后的“央行干预水平”指标。参考 Levy Yeyati 等人（2013）的文章，我们将“严格干预水平”定义为“外汇储备/M2”，其中外汇储备的计算是由央行的净外国资产头寸减去黄金储备量得到。具体估计中，我们采用两步法：首先估计均衡实际汇率（ERER）；然后根据这一估计值，在误差修正模型的框架下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文章主要结果如下：首先是均衡实际汇率在新兴市场国家波动性远大于发达国家，这一点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的汇率水平与均衡值出现了较大偏离，因此我们也将相应的汇率干预措施称为“逆势而为”；最后一点，我们发现基于当期（短期）和趋势项（中长期）基本面估计出来的均衡实际汇率相去甚远。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我们发现央行的干预措施确实能够使实际有效汇率朝着央行预定方向变化。结果显示，“央行干预水平”这一指标每上升 1%，将伴随本币贬值 0.18%。当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重新计算后，这一点估计值将增加近三倍。此外另一特点就是干预效果的非对称性——央行旨在抵住升值的努力明显更为有效。上述结果在不同计量方法、样本选取下都相当稳健。

总体而言，外汇干预措施在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有效性接近，但这一效果也受到本国其他宏观变量的影响。例如，一国的通胀水平和本币的美元化（初始存款美元化比例）程度都会减弱干预效果。背后原因在于高通胀水平会削弱央行的可信度，同时在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中，本币与外币间的替代性通常较高，这也将削弱资产配置渠道在干预措施中的作用。与此对应，一国金融市场越发达，干预措施往往也越有效——这是因为本国金融市场越完善，对本币的需求越高，因此本币与外币间的替代性也会越低。但一个较为意外的结果是金融开放程度对干预效果的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从实际或是名义上衡量金融开放指标。

总的来说，短期来看汇率干预措施确实有助于影响汇率水平，并使之向既定方向变化，这也是很多政策实施者所相信的，但目前而言，在实证上还没有十分一致的证据。

本文原题名为“‘Leaning against the wind’: exchange rate interven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works”。本文作者 Christian Daude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局的资深经济学家；Eduardo Levy Yeyati 是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和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经济与金融系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9 月载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课程改革？

Carlos De Sousa /文 许平祥/编译

导读：目前的经济学课程几乎是主流经济的单一范式，这阻碍了经济学进步。我们需要在教育体系中增加理论、方法论和跨学科的多元性，并在课程中引入复杂性，以使其更贴近现实世界。编译如下：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道：“一个学生通过学习教科书中的范例，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他毕业时，便加入‘学习了同一个模型’的经济学家群体，其随后研究引发公开分歧的可能性较低。”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课程改革一直是学术和政治界中新兴的争论话题。高层决策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生团体正在呼吁推动课程改革，在其教育体系中引入多元化，以使这一“沉闷的科学”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1、单一的经济学科主流范式

当前经济学课程最具争议的一个地方，在于其几乎完全关注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倡议书中(ISIPE)提到：“这种一致性在其他学科领域闻所未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只关注佛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学项目，或只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议题；包容性和全面的经济学教育应该促进各种理论和观点的交锋……”

后危机经济社团在名为《经济学、教育和厌学》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曼彻斯特大学所谓的“单一”主流或正统经济学，认为这是英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单一性也让教授们更容易相信他们的方法是唯一学习经济学的途径，或至少是能证明经济学教授在我们大学地位的唯一有效方法。我们的许多教师真诚地相信“经济学范式”是唯一研究经济学的合理方式……”

2、经济学被单一范式统治并非偶然：根据库恩的理论

经济学是单一的学科，因为它是门建立了“范式”的科学，其他社会科学仍处于前范式阶段。根据自然科学的演变历史，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描述了科学发展从“前范式时期”到“常规科学”的过程。一旦一门科学成为了常规科学，其进一步发展就可能面临科学革命的周期性危机及其后的范式转变，之后又重新回归常规科学。“前范式时代”主要围绕方法的合法性、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标准而频繁展开深度讨论，这虽有利于形成学派争鸣，但不利于达成共识。而自然科学虽然有不同竞争性观点，但每个观点都部分来自于或大致符合科学观察的规定和方法。

当学术界形成了普遍认同的学术成果时，范式就诞生了，这是一个能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标准问题和解决方式的时期。范式的成就足以地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展开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基于共享模式，致力于相同规则和标准下的科学实践。承诺和明显的共识是常规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即对特定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当如上定义的范式产生，我们才能说这是一门常规科学。常规科学是大多数科学家毕其一生贡献的事业，它通常基于这样的假设：科学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例如，常规科学经常压制原始新奇观点，因为它们可能颠覆现有的基本信念。

库恩仅在其简要讨论 1962 年国家社会科学时提到过一次经济学。有趣的是，当库恩写他的论文时，宏观经济学还未在动态性、定量和微观基础方面达成共识。如果没有 70 年代初淡水派和盐水派的争斗，这种共识不可能形成。在新古典经济学胜出之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决定使用主流范式（微观基础）创建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3、如果常规科学都由范式主导，为何要担心经济学缺乏多元化？

简而言之，世界已对经济学的异常事件（范式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有了充分的认识，不能继续忽视或以某种特例解释它们。因此，经济学正处于危机之中，这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并在其教育体系中引入多元性，以增加变革的可能性。

任何范式都不可能解释所有现象。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关注理性预期假设下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相反，仅仅证伪某一范式是不够的。我们正在回归库恩：

“拒绝某一范式的决定总是同时意味着接受另一个范式，这一决定涉及两个范式的比较和交互……拒绝一个范式的同时没有另一个替换选择是对科学本身的拒绝。”

当前的经济学范式并未被取代，也不会被取代，除非出现更好的替代品。尽管金融危机期间的研究非常类似于前范式时期，但我们不可能回到前范式时期。所有危机始于范式的模糊，以及随之而来的常规科学研究约束的放宽。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异常观点越来越被认可，该领域的更多权威言论开始获得关注。

用库恩的术语和定义来说，当世界已经对异常现象形成了充分认识时，经济学开始进入危机时期。Benoît Cœuré 注意到，“去年诺贝尔奖授予了罗伯特·希勒，肯定会鼓励更多关于该领域的研究”。经济学的教学是“严格和死板的”。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主流经济学范式，成为该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当他毕业时，他便加入“学习了同一个模型”的经济学家群体，其随后的研究将不太可能引起公开分歧。但在科学正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改变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使其更加多

元化，有助于提高科学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过渡到新的范式。库恩认为，科学进步发生在两个层面：通过解决问题把更多属性融入常规科学概念箱中的累积式，和通过科学革命的跳跃式。没有后者，即如果科学界并不清楚异常现象，那么危机和范式转换就不可能发生，科学反而可能会退化。

4、国际学生呼吁课程改革

全球最领先的学生组织和其他机构共同推动这场经济学课程改革，即呼吁课程增加多元性，且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政策议题。正如 ISiPE 的公开信所说，这些机构所谓的多元性指：“理论多元化，即覆盖更多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多元化，即纳入定量方法；跨学科多元主义，增加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交互，如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和经济思想史等。”“推动学科更接近真实世界”至少能以两种不同方式来解释。对一些人来说，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分析应少点抽象（更少地基于模型）、多点经验主义。Benoît Cœuré 等其他人则认为，需引入更多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非停留在过于简化现实的短期模型中。第一种解释并非对所有经济学本科教学项目都成立，有些系就强调应用多于理论。但在很多情况下，对分析真实世界的理论工具的学习往往放在问答部分或每门课程的最后一节课，且通常不计入学分。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解读，使经济学更接近现实世界以便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理论工具仍是目前的一项挑战。

5、培养更好的政策经济学家

“今天的大学生是明天的决策者”，改善经济学课程，对培养更多优秀专业人士以提供更好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对央行行长来说，经济学课程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在“反思经济危机”的演讲中，Benoît Cœuré 强调了学术和政策制定之间的时间性问题：学术以探寻真理这一长期目标为追求，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奢侈的长期时间”。不幸的是，对暂时性不同的处理影响了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典型方法是：首先考虑无摩擦的基准模型，例如长期稳态均衡，然后加入摩擦来充实它。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方法容易让人忽视短期和中期动态性、调整的剧烈性和复杂性，而这些对央行至关重要。

Benoît Cœuré 的视角与学生群体有所不同：虽然他也提到需要更加多元化、更接近政策，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世界的摩擦和复杂性在主流方法中的重要性，而这通常是博士阶段的课程。

本科阶段使用过于简单化的模型，最常见的理由在于，认为需要一定复杂程度的数学，超出了平均学生可以理解的范畴。然而，纳入摩擦、市场失灵、粘性价格和其他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因素，形成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可以无需博士课程的严谨数学而在本科生中进行教学。

通过教授学生经济直觉和复杂模型的结论，可能极大增加他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否则，他们将只能通过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获得提高。

6、结论评述

概括性地，经济教育应改善课程：

把复杂性引入本科生教育，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世界：经济学者掌握了更好的工具以应对政策挑战，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目前非常规的经济环境，这将使公共机构及私营企业雇佣到更好的员工。

不放弃必要的严密性，增加理论、方法论和跨学科的多元性：主流经济学教学需培养学生应对、解决常规科学中众多谜团的能力。这将培养出新一代具有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他们更可能对经济学基础提出质疑，最终导致科学进步。

本文原题为“Economic curriculum reform: why do we need it?。本文作者为 Bruegel 附属研究人员。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日本与亚太经济合作：寻求超越 TPP

William W. Grimes /文 刘兴坤/编译

导读：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推动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安倍政权将加入 TPP 作为其提振经济“第三只箭”的一部分，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命运与是否成功达成 TPP 协议密切相连。但是，目前 TPP 谈判进程举步维艰，迫使日本不得不寻求超越 TPP 的经济政策。编译如下：

2013 年 7 月 23 日，日本正式加入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贸易协议谈判——TPP 谈判。之前，日本国内为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前两任首相也曾试图说服其联盟加入 TPP。数年之后，安倍政权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通往贸易和投资全面自由化的道路，以求提振日本经济。TPP 不仅能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也能推动日本国内经济改革。然而，目前 TPP 谈判陷入僵局，并且日本关于全面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也不能兑现。这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1、亚太经济中的日本

尽管传统观点认为日本曾经的经济奇迹源于“出口导向型增长”，但是实际上日本经济在很多方面较为封闭。1985 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元迅猛升值，使得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转型。日本企业开始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本国所需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并且持续一段时间，这促进了东亚地区在电子消费品、信息技术硬件、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广泛的区域内生产网络的形成。区域内生产网络是指成员国家基于各自竞争优势而形成的区域内劳动分工，为供应链上下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目前，区域内生产网络促生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内贸易，其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随着日本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东亚区域内外包不仅局限于这些。日本银行、贸易公司和航运公司也建立起了支撑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区域和全球运营体系。当然，日本和日本企业不再是东亚地区经济的核心，并且区域内生产网络促进了日本的去工业化，也滋生了诸多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将更加依赖于其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日本是否更加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决于本国私人经济部门的决策和行动，因为企业和银行决定如何维护既存市场及如何优先开拓新市场。当然，政府政策在刺激鼓励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TPP 的理论与实践

TPP 概念的提出是为创造一个高质量的“21 世纪”贸易协议，其涉及范围广泛，同时进一步深化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拟达成的 TPP 协议包括管理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农业政策、金融规制、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行为、劳动力和环境等方面的规则。通过投资国的争端解决机制能

够强化这些规则的约束力，因为投资国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外国投资者挑战东道国的当地法律，进而削减成员国家的决策自由裁量权。

因此，TPP不仅是一项贸易协议。如果TPP的每项约束规则都得到最大化实施，那么将会对许多成员国家（包括日本）的经济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对于日本来说，TPP赋予安倍政权“第三支箭”诸多的优先权，同时也为美国-日本自由贸易协定（FTA）提供了一种“后门”方式，而美国-日本自由贸易协定长期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的。从外部来看，TPP将为日本企业进入其他11个成员国市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时享有与当地企业同等的机会。从内部来看，TPP将给日本当头一棒，刺激其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迫使日本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成本竞争力，增强诸如健康医疗和法律服务等长期被保护部门的竞争力，减少对诸如日本邮政和NTT等不完全私有化机构的政策倾斜。

然而，理论不一定与现实一致。许多成员国家中存在对TPP的反对意见，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的“21世纪”问题（即“境内”问题、电子商务、供应链设施、知识产权、环境、劳动力等），还包括“20世纪”问题。“20世纪”问题也许是截至目前为止参与TPP谈判的两个最大经济体——日本和美国尤其关心的焦点。根据大量的新闻报道，因日本不愿意接受农产品的自由进口，美日双边谈判长期陷入僵局。来自美国民众和政治的反对加入TPP的呼声也很高涨，尤其是担心日本汽车产业竞争的“铁锈”地带（重工业衰退地区，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工业衰退地区）。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以表达其进行贸易谈判的诚意。数十年来，贸易促进授权要求国会不加附加修正地赞成或否决贸易协定，这一直是审议通过贸易协议的主要工具。如果没有贸易促进授权，我们很难想象美国TPP的合作伙伴将会做出其最优和最终报价，或者很难想象贸易谈判能够成功达成。某些评论家将2013年以来TPP谈判步履维艰的责任归咎于日本对其本国农业保护的不让步，但是这也可以被认为日本政府将一直坚持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决策，直到确定贸易谈判即将达成——而这只有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之后才能实现。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判断安倍政权的准确意图。

3、TPP与安倍经济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加入TPP将获得比其他参与国家更多的好处，至少从绝对数额上是这样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不是日本企业将因进入其他TPP成员经济体的市场而受益，而主要在于废除其自身对进口和国内竞争力的保护壁垒，因为这些壁垒成为农业、纺织业、法律和健康服务业低效率的长期保护伞。根据经济学原理，将此类产业的生产企业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中或者能够促使它们提高效率，或者驱使其退出原有行业而将资源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经济部门。

换句话说，要振兴日本经济，大规模的国内经济改革要比TPP国家之间签订

贸易协议更加重要。安倍政权将针对TPP的评价视为国内政策工具，并且TPP的若干条款印证了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主要内容。然而，日本国内对于这一变革的政治阻力是巨大的，并且在推进结构改革进程方面进展有限。结果导致了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与TPP谈判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

4、TPP 谈判进程持续低迷，日本将会怎样？

日本同时面临如何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实施国内改革的问题。幸运的是，尽管关于 TPP 的口头承诺是东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以及日本国内改革日程中的关键环节，但仍存在其他的选择。对于国内改革来说，日本政府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现有的改革，尽管随着 TPP 谈判进程不断推进最优选择会发生变化。不管有没有 TPP，重要的国内经济结构改革不可避免地是一项政治意愿，最终的成功并不会是剧烈的改革，而是渐进式改变累积的结果。当然，成功与否并不能保证。但是如果安倍政权在“第三支箭”上更加激进一些，重要的结构改革进程可能会成功。

对于贸易协定来说，区域一体化前景并不明朗。这不仅体现在 TPP 谈判进程步履维艰，而且日本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谈判仍处于初级阶段或裹足不前。所有这些谈判都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其中大部分谈判使得日本与颇具活力的东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是没有哪个谈判能够在短期内实现。

幸运的是，贸易协定的潜在重要性不仅仅局限于区域谈判。多哈回合的失败促使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多边贸易协议的出现。日本能够从最近不断出现的贸易协定中受益，包括 WTO 贸易促进协定以及国际技术协定(ITA)，其成功地废除了零部件贸易的诸多壁垒，促进了信息和通讯技术硬件行业的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还包括政府采购协议(GPA)、服务贸易协定（TISA）及环境产品协定（EGA）。通过废除意愿达成联盟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些多边协定将会促进日本与其亚太邻国之间经济的进一步融合，而无需执着于无休止的 TPP 谈判。

5、超越TPP的经济政策

上述情况对于日本来说可谓好消息。TPP战略具备“一箭数鸟”的潜力，有利于促进国内改革、区域一体化和巩固美日联盟。然而，日本不一定能够同时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假如TPP协议不能够在短期内达成，日本政府可能明智地集中精力推动国内改革和重启多边举措。据此，日本能够实现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本国企业将会充当自信而强大的参与者。

本文原题为“Japan and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Looking beyond TPP”。本文作者为波士顿大学 Pardee 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进口产品的作用与进口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Mohammad Amin 和 Asif Islam/文 刘洁/编译

导读：本文选取 26 个国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进口成本与企业的原材料投入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口成本与进口额之间或许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上述结论极为重要，因为近期有些研究指出进口原材料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编译如下：

1、引言

近期相关研究表明，使用进口或外国中间投入品将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这或许是由于外国投入品蕴含优良的技术，或是由于某种外国投入品与本国投入品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并未深入分析外国投入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

本文运用 26 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的重复截面数据，分析了进口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投入比例的，其中进口成本的数据源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这是我们了解外国投入品使用与贸易政策设计之间关系的第一步。我们的估计方法囊括了不同时期的进口成本与外国投入品之间的回归变化情况（如图 1），因此基本不存在纯截面回归容易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从数据和经济学层面证明了进口成本与外国投入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本文还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即使是那些进口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增加对外国投入品的利用而进一步降低其进口成本，从而获得实质性收益。

本文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了进口成本与外国投入品使用之间的关系，并估计出其数值。第二，基于一般抽样原理，运用跨国可比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帮助决策者制定出提高外国投入品使用比例的政策，并促进经济增长。

2、数据及主要变量

数据主要来自对 2004-2011 年 26 个发展中国家的 14000 家制造业公司的分层随机取样，源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ES）。这些调查对象代表了私人非农经济，并且它们在国家间和时间层面上均具有可比性。

因变量是企业的外国原材料投入比例，进口额的样本平均值为 36.4，标准误为 37.4。平均两期来看，使用进口投入品最高的是阿尔巴尼亚（64.8%），最低的是墨西哥（15.1%）。

主要的解释变量是由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提供的进口成本。进口成本的均值为 1733，标准误为 1000。如图 1 所示，进口额与进口成本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可以用于合理估计。

我们控制了一些变量以解决省略变量问题。第一，设定国家虚拟变量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方面的影响（国家固定效应），并设定另一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层面的全球性影响因素，设近期调查的值为 1，早期调查的值为 0（时间）。第二，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层面的变量，这些变量均与贸易开放有关，如人均 GDP、调整后的 PPP、所有商品关税税率的加权平均以及贸易开放度指数。为了扩大关税税率和贸易开放度指数的范围，我们使用的是这两个变量在调查年份之前 2-3 年内的平均值。第三，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企业层面的一些变量，它们或许与进口成本或进口额有关，包括永久员工的总量（公司层面）、企业成立年限，并设定一个虚拟变量：当企业在调查年份前已被检查，该值为 1，反之为 0。还有用 0-4 范围内数值表示的企业严格等级（值越高表示越严格），包括税率、税政、获得执照和许可、以及腐败程度等与当前企业运营有关的一系列约束因素。

3、研究结果

见表 1，第 1 列显示了基于国家固定效应与时间可变效应的进口额与进口成本之间的基本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进口成本的估计系数值为-0.016，在 1%的水平内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并未改变结果的本质——进口成本的估计系数仍为负数且在 1%的水平内显著（第 2-6 列）。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相关系数由-0.016 升至-0.021。因此，按照基本估计来看，进口成本提高 1000 美元，企业的外国投入品比例将提高 16%，约 0.43 个进口额的标准误单位（第 1 列），按照完整估计来看将提高 21%，约 0.56 个进口额的标准误单位（第 6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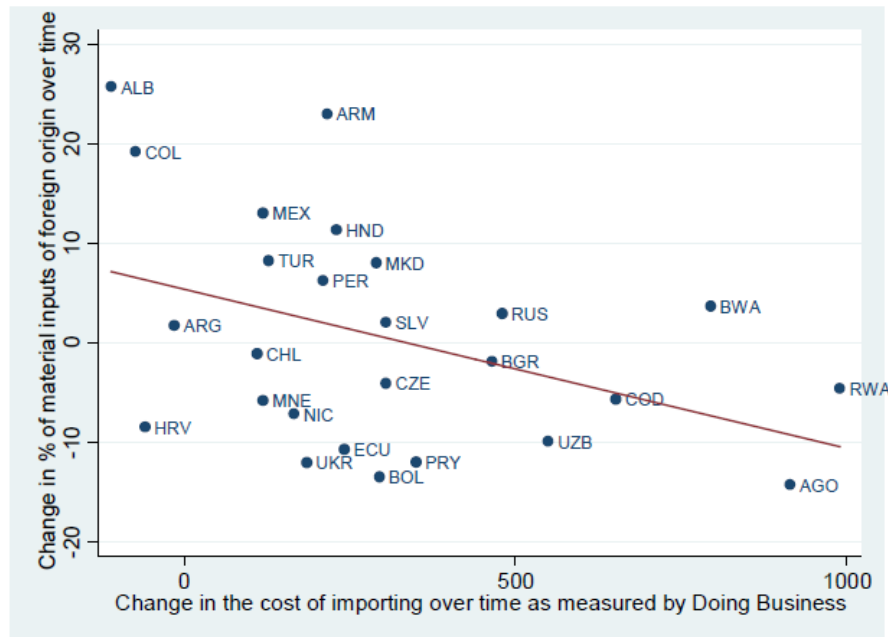
收入与企业规模对进口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因此越是发达的国家、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表 2 加入了进口成本的二次方变量，并重复了表 1 的估计过程。我们发现进口成本与进口额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这表明，尽管在我们的样本中，进口额与进口成本总是表现为负相关，不过当进口成本更低时，该负相关程度将更严重。这种非线性关系或许是因为：当进口成本较高时，企业将提高对必须投入品的进口比例，因为这些产品不会受高进口成本的影响；另一种可能是，在进口提高之前，增加进口的固定成本意味着实质上降低进口成本。无论哪种解释，上述非线性关系对于我们合理测定外国投入品与进口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4、结论

近期大量文献聚焦研究进口投入品对生产率和企业增长的重要性，这给决策者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何种政策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得外国投入品？本文研究得出：进口成本对企业的外国投入品比例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并且当进口成本相对较低时，该负效应更显著。因此，那些能够降低进口成本的政策或许有助于提高外国投入品比例，进而促进本国企业发展。

Figure 1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shown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less than the 5 percent level.

Table 1: Base regression results (controlling for country fixed effects)						
	(1)	(2)	(3)	(4)	(5)	(6)
Dependent variable: Imports						
Import Cost (DB)	-0.016*** (0.001)	-0.017*** (0.003)	-0.018*** (0.001)	-0.018*** (0.002)	-0.018*** (0.001)	-0.021*** (0.001)
Time (dummy)	5.365** (0.030)	1.403 (0.659)	0.806 (0.796)	0.823 (0.790)	0.732 (0.811)	-0.185 (0.964)
Income		14.268 (0.147)	19.783** (0.036)	20.911** (0.026)	22.137** (0.020)	29.859*** (0.004)
Employment (logs)			3.347*** (0.000)	3.513*** (0.000)	3.573*** (0.000)	3.543*** (0.000)
Age of the firm (logs)				-1.044 (0.278)	-1.063 (0.277)	-1.421 (0.172)
Time tax (%)				-0.049 (0.208)	-0.058 (0.147)	-0.043 (0.288)
Inspected (dummy)				0.947 (0.613)	0.511 (0.778)	0.509 (0.788)
Severity of obstacles					1.862*** (0.000)	1.950*** (0.001)
Tariff rate (%)						-0.706 (0.236)
Trade Freedom index						-0.254* (0.099)
Observations	14,052	14,052	14,052	14,052	14,052	13,565
R-squared	0.128	0.128	0.143	0.144	0.148	0.156

All regressions control for country fixed effects and include a constant term (not shown). p-values in brackets. Significance level is denoted by *** (1%), ** (5%) and * (10%). Huber-Whit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on country-year are used. The estimation method used in OLS. The regressions are based on a sample of 26 countries in columns (1) to (5). In column (6), two countries are excluded due to missing data on Tariff rate and the Trade Freedom index.

Table 2: Non-linear model (controlling for country fixed effects)

	(1)	(2)	(3)	(4)	(5)	(6)
Dependent variable: <i>Imports</i>						
<i>Import Cost</i> (DB)	-0.029** (0.011)	-0.033*** (0.002)	-0.035*** (0.002)	-0.034*** (0.002)	-0.036*** (0.002)	-0.038*** (0.001)
<i>Import Cost</i> - squared	1.89*(E ⁻⁶) (0.110)	2.44*(E ⁻⁶)** (0.025)	2.49*(E ⁻⁶)** (0.019)	2.45*(E ⁻⁶)** (0.021)	2.59*(E ⁻⁶)** (0.016)	2.51*(E ⁻⁶)** (0.020)
Time (dummy)	6.499** (0.020)	7.749*** (0.003)	2.247 (0.463)	2.250 (0.459)	2.240 (0.455)	1.971 (0.650)
<i>Employment</i> (logs)		3.300*** (0.000)	3.394*** (0.000)	3.570*** (0.000)	3.634*** (0.000)	3.613*** (0.000)
<i>Income</i>			20.009** (0.029)	21.049** (0.020)	22.299** (0.014)	29.071*** (0.004)
Age of the firm (logs)				-1.082 (0.265)	-1.103 (0.263)	-1.472 (0.161)
Time tax (%)				-0.048 (0.225)	-0.056 (0.161)	-0.042 (0.305)
<i>Inspected</i> (dummy)				0.865 (0.644)	0.418 (0.817)	0.441 (0.815)
Severity of obstacles					1.888*** (0.000)	1.981*** (0.001)
Tariff rate (%)						-0.533 (0.371)
<i>Trade Freedom index</i>						-0.255** (0.050)
Observations	14,052	14,052	14,052	14,052	14,052	13,565
R-squared	0.128	0.142	0.144	0.145	0.149	0.157
Significance level is denoted by *** (1%), ** (5%) and * (10%). Footnote under table 1 applies here as well.						

本文原题为“Use of Imported Inputs and the Cost of Importing: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作者 Mohammad Amin 和 Asif Islam 均为世界银行企业研究部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世界银行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应以名义 GDP 为目标

Pranjul Bhandari 和 Jeffrey Frankel/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依然在找寻（与公众）一种透明而可信的交流，然而通过前瞻指引或承诺来传递其意图有时会造成负面约束。本文认为，相比较于将通胀作为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若以名义 GDP 为目标，则将面临更少供给冲击与贸易冲击。编译如下：

许多国家的央行仍在追求透明性与可信度，这固然是有益处的，但其损失就在于，一些未预计到的事件已然将过去的种种承诺转变为对当时货币政策的一种约束，而这恰恰是不合意的。

现今（央行）阶段性目标的许多候选方案都已经被尝试过，而大部分都失败了。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那个货币主义的全盛时期，许多国家的央行宣布以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其目标。然而，一旦货币流通速度发生改变——更确切的说，货币需求发生未预期到的增长，就将使得这些目标具有极强的约束性，最终变为不可能。许多新型市场国家的央行则重新将汇率作为其目标，却最终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冲击而被迫放弃这一目标。

紧接着出现的则是通胀目标，这一“新生儿”迅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流行起来。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其目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Fraga et al. 2003）。例如，当世界油价意外上升时，一些以通胀作为目标的石油进口国被迫作出选择：是放弃通胀目标，还是采取足够幅度的货币升值政策以防止国内油价的上涨。前者显然是与设立目标本身的意图相矛盾的，而后者则意味着在应对不利的外贸冲击时，“任性”地采取货币升值的措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以通胀为目标失去了它的“荣光”（Reichlin 和 Baldwin 2103），这就好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汇率目标失望透顶，而在 80 年代则是放弃了货币供给目标。

当央行屡次没有达标，它将渐渐失去了可信度，甚至还不如它从一开始就保持缄默。

或许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会在一段时间内选择放弃，不再尝试用一个单一的经济变量来表达它们的意图。然而，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放弃”却成为一种奢侈。它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地需要民众的信任，这有时是因为过去曾出现过的高通胀，或者是权威机构的一次失职，抑或出于预算赤字货币化的政治压力。

以名义 GDP 为目标的倡导者则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如果货币当局通过名义 GDP（NGDP）来作为其年度目标，那么不论未来的发展如何，他们都有希望能够自圆其说。例如，当面临一个不利的贸易供给冲击，以 NGDP 为规则可

以保持总需求的平稳，而这是较容易通过货币政策达到的。供给冲击往往会平均的反映于通胀与低产出。这或许与绝大多数政策设计者如何作出反应是紧密相关的，有时甚至不受其过去陈述的约束。相反，若以通胀为目标，则意味着一个更甚的货币紧缩和经济衰退（e.g. Frankel, 1995, or Frankel et al. 2008）。

提出以名义 GDP 为目标的大多是一些工业化国家（Frankel, 2012, gives other references to the literature）。但事实上这一想法更适合于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能够经受一些大的外贸和供给冲击，而以 NGDP 为目标在面临这些冲击时往往是比较稳健的。

近来，以 NGDP 为目标的方案有了复苏趋势，这主要集中于那些希望采取货币扩张的国家，包括一个可预期的通货膨胀（Woodford 2012），其动机在于拉动美、英、欧、日这些国家的经济疲弱，从而走出 2008 年那次严重的需求冲击所带来的大萧条。当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当下并不需要货币扩张抑或通货膨胀。然而，以 NGDP 为目标的方案并不仅仅可以达到货币扩张，它其实还可以达到任何的货币目标。这个方案最初由 Meade（1978）和 Tobin（1980）提出，并得到了 80 年代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当时的动机在于形成某种货币规则，特别是降低通胀，而并非货币扩张及提升通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反通胀措施仍然是需要的。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外贸冲击的影响，因为相对于全球市场，它们往往是价格接受者。同样，它们也更容易受到供给冲击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地震和台风之类的自然灾害、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罢工）、农业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及生产率的变化。事实上，生产率本身的冲击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加严重。在其腾飞期，国家不知道它的高速增长是长久的抑或暂时的（源于商品市场以及国内需求的短期波动）。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它们的增长趋势同样具有不确定性（Aguiar 和 Gopinath 2007）。

天气波动、自然灾害和贸易条件冲击，这些供给冲击具有外生性和可度量性，由此可以来估算供给—需求的联立方程组。而其理论模型的核心——外生的生产率冲击则难以在实证经验上说清楚。这一争论可体现于这样一个模型，在平方损失函数（quadratic loss function）中最小化产出和通胀，但同时要避免 Rogoff（1985）所犯的通胀偏误问题。这证明了以 NGDP 准则可以主导通胀目标，除非总供给曲线极其陡峭，或者价格稳定性的权重很大。在一些前提下，使得 NGDP 准则有效的必要条件是供给曲线的斜率不小于 $1 + \sqrt{2}$ （Frankel 2014）。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通过估算中等规模、中等收入国家（受到外生、可测量的供给和外贸冲击）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以考察这个标准是否

得以保持。对于类似于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石油出口国和印度这样的石油进口国，国际油价是其外贸波动的外生因素。影响需求的外生因素则包括其贸易国的收入水平以及国内的一些政府支出。在印度和哈萨克斯坦的估算系数表明，其总供给曲线非常平缓，足以满足 NGDP 准则的要求从而比以通胀为目标更能实现最小化平方损失函数（Bhandari 和 Frankel, 2014, for India, 1996-2013; 和 Frankel, 2013, for Kazakhstan, 1993-2012）。直觉上来说，如果在应对不利的供给冲击时，采取通胀目标来防止价格上升，那么产出上的下降将是巨大的。

统计数据估算固然给出了大量有利证据，然而其他研究者同样估算了短期供给曲线的斜率处于此范围内，这个理论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一个基本结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相较于通胀准则，其央行采取 NGDP 准则更能够避免供给和外贸冲击造成的影响。这一逻辑始终是成立的，无论目标是反通货膨胀抑或是通货再膨胀；无论我们考虑的是水平值抑或变化率；无论央行是采取事前预测或事后指标的方式来表达其目标。如果真的值得去设立一个目标，那么就应当选择一个我们能适应的。

本文原题名为“Central ban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consider targeting nominal GDP”，查看参考文献可点击以下链接。本文作者 Pranjul Bhandari 和 Jeffrey Frankel 分别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Mason Fellow）和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为什么央行应当增加政策透明度

Richard Barwell, Jagjit Chadha/文 苏丹/编译

导读：当面临危机时，前瞻性指引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本文认为央行应当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尤其是在经济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向公众阐明央行将会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形，货币政策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编译如下：

自 1998 年 Alan Blinder 批评央行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神秘性以来，各国央行在提高政策有效沟通上做出了非常显著的努力。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央行仍然不愿意采取政策完全透明化的策略，但对未来政策路径前瞻性的指引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本文认为央行应当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详细地描述他们对未来经济的看法，以及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形下会采用何种应对方法。

1、回归基本：分布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未来不确定情形发生概率的分布是宏观政策争论的焦点。尽管在某些较强的假设下，央行只考虑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最合适的做法（Tinbergen 1952, Theil 1958）。文献中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应当反映出所有可能结果的影响，而不是仅仅考虑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事实上，即使我们只需要考虑最有可能的结果，我们也需要了解整体分布状况及其他信息，例如方差和偏度在政策制定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制定政策前，央行应当检验所有可能发生结果的概率分布状况。这既可以使政策制定者了解到最优政策立场应当如何演变，也可以衡量出政策路径的不确定程度。通过集中考虑一些最可能发生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制定出状态依赖的策略路径。

2、可实现的目标：预测分布

预测概率分布，即构建宏观经济指标未来可能实现值的概率密度函数，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通常需要一系列方法和数据的结合。数据分析以及预测误差评价在变量选择上的确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指引。实证分析方法也可以提供对许多变量联合分布预测的结果（Wallis 2005）。

我们也可以从期权市场中提取信息进行预测。理论上来看，期权价格中包含了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信息，通常在预测上也会更加有效。最后，作为央行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从而判断预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在金融危机前后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变量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结构性变化。但是预测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完善。

3、增加政策透明度的利与弊

对于一个执行最优政策的央行来说，是否应当公开信息，并向公众详细阐述未来政策可能的演变是它唯一需要考虑的。反对央行信息透明化的观点通常有三个，分别是：

- 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不确定程度的大小，市场参与者可能会仓促地做出决定，从而增加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不稳定。
- 如果未来政策偏离最初的“承诺”，央行的声誉可能会受到损害。
- 当高阶信念（Higher Order Belief）影响非常显著时，市场参与者的从众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Morris and Shin 2000)

这些反对观点适用于央行任何进行信息传递的方式。然而如果完全实行前瞻性指引政策，这些反对意见就不足为虑。的确，强调未来的不确定可能会使得市场参与者认为央行“承诺”的最优政策路径可信度降低，但央行可以通过公开说明预测结果没有考虑 X 或者 Y 的风险，从而鼓励私人部门进行更多的信息披露，减少不确定带来的影响。

如果我们暂且忽略完全前瞻性指引政策的成本，那么增加政策透明度的好处是什么？我们认为，公开信息一方面可以帮助移除和未来央行政策有关的资产价格波动。有关经济前景和政策方案的陈述可以充分地反映央行对经济状况的判断以及其可能的应对措施，这些信息的公开都有助于减少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后政府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基础上，增加政策透明度有助于降低市场对于政策制定者在一些不重要场合评论的反应剧烈程度。2013 年 5 月和 6 月因“QE 退出”而引发的市场动荡就是鲜明的例子。

4、一些建议

Barwell 和 Chadha （2013）一文以英国为例介绍了央行政策沟通策略上的改革。英格兰银行已经做出了非常显著的改革，包括公开每季度对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内部预测结果(McKeown and Paterson 2014)。这些结果都依赖于对央行政策立场的特定假设，例如有关基准利率和购买资产行为的一些假设。在我们看来，央行还应公开对未来政策立场的预测结果。通过增加对货币政策立场的预测，这些公开信息可以反映出委员会对经济前景看法，以及对当前政策立场不确定程度的大小。不确定程度可以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公开经济预测结果对特定假设敏感程度的检验结果，但是在这些情景分析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未涉及。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细致的描述和讨论。

虽然在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安排上，不同的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大部分国家，政策是由委员会制定的，并且央行也非常鼓励委员会成员发表个人看法。许多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公开内部投票的结果，尽管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在我们看来，这一滞后的存在会导致没有必要的市场投机行为及波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成员越来越有可能在当前货币政策立场上产生分歧。与其要求政策制定者提供未来几年政策立场的点估计结果，我们认为提供反映未来不确定情形的相关报告是更加有效的做法。在给定不确定性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周期可能来源的情况下，央行的确需要考虑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本文原题为“Publish or be damned – or why central banks need to say more about the path of their policy rates”。本文作者 Richard Barwell 为苏格兰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Jagjit Chadha 为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结构性改革降低国家风险

Christopher Findlay, Silvia Sorescu, Camilo Umana Dajud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面临高风险溢价的经济体已经意识到采取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政府认为结构性改革发挥作用需要的时间太长，因而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本文发现，金融市场的表现反映出了结构性改革的优势。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体系中，应该加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权重。编译如下：

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很多经济体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一些国家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以使债务比率在可控范围之内。

然而，这一对策是否有效，值得商榷。比如，有些国家采取激进的措施降低公共部门的债务水平，但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而法国公共部门债务占 GDP 比例预计在 2014 年达到 91.8%，其在 2014 年 7 月通过十年期债券融资 34 亿欧元，但债券的发行利率只有 1.77%。

1、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如何应对危机？经济学家不仅强调债务水平，还强调经济体的潜在增长，以及影响潜在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政治家认为结构性改革发挥作用需要太长的时间，不能用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他们倾向于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结构性改革真的不能发挥作用吗？

Miguel Cardoso 和 Rafael Doménech 认为，金融市场的状况不仅能体现政府稳固财政的能力，还可以反应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水平。因此，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上不同的风险溢价，既能反映公共债务赤字和债务水平，也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他们发现，政府未来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能力与经济体的风险溢价水平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75。也即是说，政府现在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就等同于在提高经济体的融资成本。

这一发现对于讨论结构性改革和财政紧缩哪个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很具有启发性。目前，大家倾向于强调二者的共同作用，但财政紧缩政策更得到政治家的青睐，因为他们认为结构性改革不会立竿见影。

但是，Miguel Cardoso 和 Rafael Doménech 还发现金融市场通过评估不同国家的风险溢价，有助于结构性改革发挥作用。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仅仅由于结构性改革发挥作用所需时间太长，而忽略其好处，未免有些不合适。

2、估算结构性改革对风险溢价的影响

我们研究了很多代表结构性改革能力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对风险溢价的影响。通常认为，国家风险溢价由公共债务水平和外汇储备的规模决定。在我们的标准模型里，我们采用了平均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s)来衡量风险溢价。结果

发现：外汇储备降低风险溢价，债务水平提高风险溢价。但模型无法解释风险溢价的波动。

至于结构性改革，我们搜集了 19 个 OECD 国家将近 40 种不同的测量指标，包括劳动力市场管制、商业监管、人力资本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的质量以及创新能力等。为了找到哪些指标应该引入最优模型中，我们采用“跳跃”算法将这些指标引入上述的标准模型，结果如下：第一，很多变量是显著的，而且结果比标准模型更具有说服力；第二，包含 7,13,14 个解释变量的模型是最优的，但其中体现宏观基本面的变量只需要一个；第三，当加入最后一组结构性改革变量后，风险溢价的符号由正变负。这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一些列促进增长和偿债水平的改革措施，高债务水平不一定导致高风险溢价。

3、结论

- 金融市场是“聪明”的。金融市场倾向于将资金借给未来有较好增长预期的低风险经济体。金融市场似乎能够辨别这些经济体为了将来再融资需要而采取的降低风险溢价的措施。
- 金融市场可以反映出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也即是说结构性改革的益处可以立竿见影，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体系中，应该加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权重。

本文原题为“Structural reform lowers country risk”。本文作者分别为阿德莱德大学教授，OECD 研究员和巴黎政治学院的博士生。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拥抱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

Nicholas R. Lardy/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中国经济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长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私营企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私营企业在崛起中的三重因素，并指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或许能使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编译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长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私人部门。改革早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并重新允许农村市场存在，农业实现了实际上的私有化，导致 1980-1985 年农产品产量极大增长。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私营工业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些企业迅速扩张，使得工业产值中国企所占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4/5 降至去年的 1/4。即便 2008 年之后许多人指责国进民退，私营企业仍以 18% 的年均速度扩张。类似地，在已开放竞争的服务类型，如零售、批发和餐饮行业中，私营企业也取代了国企，成为主要的服务提供者。

在中国城镇，私营企业的活动解释了 1978 年以来几乎全部的就业率增长。在企业部门，国有与集体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份额从 1978 年的 100% 降至如今的 18%，其中国企仅占 13%。而在中国农村，变化更为显著。农业部门的雇佣几乎完全是私人化的。即便农业雇佣有所下降，也被于农村注册的私营企业和家庭非农企业的雇佣增长抵消了，后者总共增加了 0.6 亿人。现在，私营企业也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取代了曾由国企及外资企业扮演的角色。

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在中国显著上升，可能受三方面因素驱动：对私营企业的监管环境有所改善，私营企业较国营竞争者生产率更高，以及私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及其他金融资源的渠道增多。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有关私营企业的政策与监管环境相当不利于私营企业发展。早期，政府允许家族企业存在，但它们受限于一项条款：雇佣的非家族成员不得超过 7 人。1988 年，政府公布了对私营企业的暂行规定，但这些规定仅允许私营独资企业，这意味着企业家的财产不能合法地从其运营企业的资产中分离出来。直到 1994 年公司法生效，私营企业的有限责任才成为可能。而直到 2006 年政府修订该法后，注册一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所需的最低资本才从 30 万元降至更易达到的 3 万元。同一批条款还首次批准了单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近年，政府为 600 多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更优惠的税制，这些企业正是已注册民营企业 and 家族企业中的绝大多数。

解释私营企业取代国企的第二个因素是，私营企业比国企更为高效。尤其从资产回报率的重要指标来看，私营企业一直胜于国有同行。以工业为例，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差距在过去 6 年显著拉大，现在接近 3:1——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约为 15%，而国营企业不足 5%。生产率差异很关键，因为更有效率的企业拥有更高的留存收益，而这正是非金融企业扩张时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以 2000-2008

年为例，企业留存收益解释了 7/10 的投资。即便当来自银行和非金融中介的贷款在随后几年激增，留存收益仍支持了非金融企业超过一半的投资额。总之，2000 年以来，与企业从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借来的资金总和相比，留存收益对中国企业而言一直是更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其作用方式为在上海、香港及其他全球股市出售股票，以及在国内外发行债券。

解释民营企业表现优越的第三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们获取资本，尤其是银行贷款的渠道增多了。近年来，人民银行开始公布根据借款者所有权特征划分的银行贷款分项数据。这些数据的发布效仿统计局，后者早在 1990 年代就开始公布按所有权分类的企业分项数据。如在工业产值一例中，归于国家的份额不仅包括传统国有企业的产值，还包括确认为参股公司的国有企业产值，如果国家已保留了这些公司制企业全部、大部分或主导的所有权。基于同样的基本概念，2010-2012 年，银行借给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贷款占其贷给企业所有贷款的平均份额为 28%，而私营及私营控股公司获得的平均份额为 52%，贷款总额在国有企业方向上的分配仍不成比例。这反映出一个事实：早些年，国企更易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获取贷款时更为受限。近年来，民营企业比以前更易进入本国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创业板与区域性场外交易股票交易所的诞生，它们容纳了小企业。

尽管民营企业在中国崛起了，部分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对其开放，包括金融、电信及其他现代商业服务，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这些领域中，国企的主导地位通过其与民营企业在制造业与服务中所占投资份额的对比得以反映。制造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度最大，现在，民营企业的投资额比国企多了 7 倍；但在服务业，国企的投资份额超过了民营企业，近年也仅表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国有与私营服务供应商的生产率差异约为 2: 1，小于二者在工业上的差异，但仍很大。

我们的结论是，通过对民营企业开放服务业中相对封闭的部分，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或能允许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即便投资在 GDP 中的份额有所下降。由于服务业更为劳动密集，允许民营企业自由进入导致的服务业增长越快，其创造工作岗位的速度越快，进而能拉动家庭消费加速。这一传导机制的实现要求三中全会提出的关键经济改革措施得以执行，尤其是消除一切垄断（自然垄断行业除外）、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的决心。这些改革将加速服务业扩张，帮助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

本文原题为“China’s Embrace of Markets Is Responsible for its Growth”。本文作者为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有崩盘危险？

Li-Gang Liu / 文 陈博/编译

导读：中国房地产市场在 2014 年遇冷。由于房地产行业和其他产业包括金融系统的紧密关联，其下滑引起了不少关注。作者认为，由于居民和开发商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此次房地产市场衰退只是周期性问题。政府还有多种政策手段可以予以应对。编译如下：

自 2014 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变得十分疲弱，销售下降，库存积累。到 2014 年 7 月为止，新增房屋库存达到了 5.44 亿平方米，大约是 2013 年成交量的 42%。用过去 6 个月的成交量来计算，一线城市去库存时间达到了 14 个月，二线城市为 16 个月，三线城市为 24 个月。温州、茂名和丹东等城市更为极端，要超过 30 个月才能消化库存。这场衰退不仅仅影响了二三线小型城市，甚至连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大城市也受到了波及。这和去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两位数的增长和热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拉动了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平均来说，从 2004 年到 2013 年，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占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 20%，住宅房地产占了 14.1%。2013 年，住宅市场就贡献了 0.8% 的 GDP 增长。房地产还能拉动装修、家具、钢铁、建材等多个相关行业。房地产市场衰退将会波及其他产业以及那些向中国出口大量资源的国家。人们同时还担心和地产行业紧密相联的影子银行违约风潮将起，中国经济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同时爆发。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受到了密切关注。

因此，在上述的背景之下，不少人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美国在 2008 年的泡沫市场相提并论，认为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但这些论调过于悲观了。

首先，中国的私人房地产市场仍然十分年轻。1998 年之前这一市场几乎为零。98 年住建部才废止了房屋分配政策，99 年住房抵押贷款才开始出现，目前的总量也仅仅约为 10 万亿左右。尽管增速较快，但这一规模仅占 2013 年银行贷款总量的 14% 左右，居民储蓄的 21% 左右。当前房产为中国居民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根据估计，房地产资产的总价值大约为股市的 5 倍左右，是居民持有的股票市值的 16.9 倍左右，但仅仅是居民存款的 2.6 倍。换言之，中国的居民负债率较低。

在过去的 16 年里，房地产市场也经历过大幅度价格和投资水平的起落。市场的周期性衰退成因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不佳、信贷紧缩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周期性起伏能让投资者避免单边下注，遏制了过度投机，反而

是一种好事。而且由于金融市场深度有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杠杆率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较低。自 2009 年起，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开始降低了杠杆率，同时中国的购房者必须支付超过 30% 的首付款。

第二，政府仍然有足够充分的政策选项来避免房地产市场过度萎缩。短期来看，政府可以放松实行了四年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在这点上，不少城市也已经行动起来了。政府还可以放宽户籍制度，允许移民购买房产并获得户口。

中期来看，政府还可以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支持公共房屋政策，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推动更多出租房进入市场。政府可以鼓励银行推出资产担保债券来解决抵押贷款期限错配的问题。房地产开发商还可以推出 REIT（不动产投资信托）或者 MBS（资产抵押证券），解决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未来十年内房产需求量有望持续高企。2023 年前，预计还将有 2 亿居民将会进入城镇。在这点上中国和日本与美国差别极大。在需求的推动下配合良好的政策指引，房地产的衰退应该只是短期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在快速累积。自 2008 年起，房地产价格上升了 64%，增速和城镇人均收入增速相同。不少城市的房价增长了 75%，远高于收入增幅。此外，房租收入占房价比在下降，目前全国平均为 2.66%。和 6% 左右的抵押贷款利率相比，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者出租的话需要承担差价损失。这也意味着太多的投资者将希望寄托在房价增长上。另外，过度依赖于影子银行进行融资也带来了流动性风险。信托资金大约是开发商自筹资金的 40%。随着库存上升，或许会出现兑付困难。

本文原题为“Is China’s Property Market Heading toward Collapse?”。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8 月刊于彼得森经济研究中心网站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Patricia Lewis /文 杨原/编译

导读：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整整 100 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有必要对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再度发生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而深入的思考。作者在文章中反复告诫，世界大战的风险并没有完全被排除，我们绝不能盲目自信和乐观。但她同时也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规避战争的方法和经验，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利用这些方法和经验将战争的风险降到最低。编译如下：

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曾预言：“（即将到来的）战争将导致所有战争的终结。”历史证否了这个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真正经历的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和平的终结”，包括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诸多的代理人战争。时至今日，暴力冲突更是越来越严重地危害到平民的安全，并且不断越过战争法所划定的红线。战争作为一种机器，连同各种可供使用的破坏力一起，业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也正因此而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战争的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传统战争、核战争、网络战争、无人机轰炸等等都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整个地球毁灭。

当前，暴力正在席卷中东，欧洲和俄罗斯也因乌克兰危机而正处于冲突的边缘，美国又一次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阿富汗则因北约的撤军而变得更加脆弱。除此之外，南中国海的岛屿争端、朝鲜半岛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正使得这些地区面临冲突升级的严峻形势。

不过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也掌握了许多防止冲突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使后代免受战争的苦难，我们建立了联合国。欧盟由最早的贸易协定发展为几十年后的正式国际组织，为欧洲由曾经的“战争之洲”转变为“和平之洲”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支撑，北约的存在使得许多欧洲国家得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被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德国和法国之间爆发战争已经变得难以想象。此外，非洲、亚洲、南太平洋、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也已建立起多个区域组织。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组建各种国际机构确保裁军以及其他安全协议得以实施，并通过高校和智库使得来自民间和社会的专业思想得以交流和传播。

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统计，1946 年以来共有 254 场武装冲突发生，其中的 114 场最终升级为战争（每年战斗死亡人数超过 1000 人）。而在冷战后，武装冲突的数量急剧下降。2013 年共有 33 场武装冲突发生，仅有 7 场被划归为战争，比 1989 年以前的数据降低了 50%。

导致武装冲突减少有很多因素，包括代理人战争的消亡、联合国对和平进程的维护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援助等等。此外，《人类安全报告》的调查显示，和平

谈判和停火协议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有效减少暴力冲突的发生。2013 年有 6 项和平协议被签署，2012 年则有 4 项。这些年来，我们似乎的确找到了一些能够创造、保持和强化和平的方法。此外，对于平民安全的保护，我们已经有了系列有关武装冲突规范和人权保障的国际法规，还有国际刑事法庭、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经济和军事制裁以及国内法律制裁委员会等多种保障机制。不仅如此，虽然核武器的拥有和使用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被完全禁止（当然在大多数国家那里已经是非法行为），但相关国际法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各国拥有和使用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武器，例如化学和生物武器、杀伤性地雷、集束炸弹以及致盲性激光武器等。

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学术研究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成果，这些成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争是如何爆发的以及如何才能避免或结束战争。当然，任何方法和体系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毕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明白了资源稀缺性、环境变化、经济压力、难民潮以及种族主义等许多因素在冲突爆发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到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了解了决策者的性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还掌握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加剧或弱化冲突风险的具体机制。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西班牙国际关系与对外对话基金会（FRIDE）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预测，到 2030 年时，世界将变得更加脆弱，在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国际政治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也将愈加严重，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将不得不同时应对这两种相互纠结的国际政治发展趋势。最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认为国家间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短期内爆发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一战爆发之前，许多人曾天真的认为，欧洲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之高，以至于不可能走向战争。二战爆发之前，许多人则寄希望于纳粹德国的扩张被遏制。我们总是倾向于过分乐观地预估战争持续的时间（“我们会在圣诞节前回家”）、冲突的规模以及最终的后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的我们应当汲取曾经的教训，抛弃自负的心理，更加现实地看待战争、和平以及我们自身。战争已经令太多的人付出了生命，让更多的人失去了亲人。以这些人的牺牲为代价，我们学会了不少预防战争的办法。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当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付诸于实践，以确保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和平。如果不这样做，万一导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那么我们甚至有可能连听我们找借口做辩解的人都很难再找到了。

本文原题为“*How to Prevent the Third World War*”。本文作者帕特丽夏·刘易斯（Patricia Lewis）为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室主任，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军控、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等。本文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发表于 Chatham Hous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以色列和埃及是时候公开放弃化学武器了

Mark Fitzpatrick/文 李骁/编译

导读：在纪念见证了化学武器大量使用的那场战争爆发 100 周年，以及要求叙利亚进行化武裁军的时刻，难道不也是埃及和以色列作出正确的事情并且使它们自己真正远离这些可恶武器的时候吗？本文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克·菲茨帕特里克撰写。编译如下：

叙利亚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后，只剩下 6 个国家置身于此公约之外。其中的两个——缅甸和安哥拉，已经开始逐步加入，第三个国家——南苏丹，可能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这样做。它可能也会继承苏丹先前（对该公约）的加入。这将会使以色列和埃及落入朝鲜那样糟糕的境地，它（朝鲜）可能是唯一一个还在推进化学武器计划的国家。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个工作组在 8 月 4 日研究了如何在整个中东落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他们中既没有我们从这两个关键国家或它们的邻国中召集的专家，也没有任何研究埃及问题的专家参与，更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以色列和埃及拥有化学武器的原因。它（这项研究）指出，特别是自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受到谴责及其后来放弃化学武器之后，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使用这种武器。一些参与者提出的唯一一项警告是，何时，而不是是否，能够使它们（以色列和埃及）同意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这两个国家都把化学武器看做其他目标上的谈判筹码。它们不想白白放弃它。埃及说以色列应该首先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此外大概也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在随后被落实。以色列也想在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外获得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关于常规和非常规威胁的地区性谈判。然而，正是对这些相关事务的坚持，将这两个国家置于了道义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它们也被指责拥有化学武器之后。

以色列人的其他主张，例如（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从而免受那些旨在暴露其核设施的质疑性检查的不正确运用，都是站不住脚的。印度和其他核国家找到了“安全的”办法，既批准公约而又避免对其核机密的威胁。以色列的正式立场是，只要该地区其他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遭到了叙利亚化学武器的破坏，它就不会批准公约。该地区另外唯一的一个非缔约国，埃及，已经于 1979 年承认了以色列。关于对叙利亚（是否）完全公布其化学武器的疑问应当马上澄清，但即使叙利亚保留了几吨这样的武器也不会造成重大威胁。因此，以色列政府停止发放防毒面具。

对我来说，关于无条件加入公约的主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化学武器的禁令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规范，不存在置身于其外的正当

理由。尽管伴随叙利亚拆除化学武器每一步的核查不可能 100%地完成，但证明了该公约的可信性以及其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中的支持者的能力。和平壤一样置身于其外的政治成本，以及作为非缔约国受到的限制，将（使它们）在特定化学品的进口方面承担商业成本。《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成员还可以在防范恐怖主义集团获得化学武器方面开展多边合作。

对于以色列来说，（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政治收益将包括给埃及或多或少地施加了压力，从而使之不再坚持在任意领域不谈论不扩散步骤，除非以色列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上有大的进展。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还可以帮助以色列从“公关黑洞”中爬出来，这一“黑洞”是由其在世界上很多人的眼皮底下对加沙进行军事进攻所造成的。尽管政府有时会迷失方向，但作为一个民族的以色列人珍视政治才能中的道德因素。对于自己的先人被希特勒的毒气室所害的人们来说，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应该不仅在道德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十分必要。

本文原题为“Time for Israel and Egypt to abjure chemical weapons”。本文作者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防扩散与裁军”项目的主持人。本文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刊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 2005 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 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6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9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3 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 28 个国家的 237 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 是 CEPR 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 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1 名。

网址：<http://csis.org/>

The World Bank (WBG) 世界银行

简介：世界银行（WBG）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简称，“世界银行”这个名称一直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这些机构联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的重建。今天它的任务是资助国家克服穷困，各机构在减轻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网址：<http://www.worldbank.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